

光绪乙未年台湾抗日斗争之战术研究

黄俊凌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清朝光绪乙未年(1895年), 清政府因甲午战败, 被迫签订《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给日本。但台湾人民“义不臣倭”, 与留守的清军一起, 抵抗日本军队的入侵。在这个过程中, 台湾军民利用一切可能条件, 充分创造和运用一些战术, 来反抗实力占优的日本侵略者。本文从有关的当时的官方档案、个人游记, 特别是结合日本当年的官方战史、随军记者报道, 对 1895 年台湾军民抗日的战术运用, 进行了分析总结, 并给予积极的评价。

关键词: 乙未; 台湾; 抗日; 战术

中图分类号: K2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08)01-0150-04

一、前言

光绪二十年(1894年), 清朝政府因甲午战争之败, 被迫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 无奈地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为了早日“接收”台湾, 任命其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 调派其精锐的近卫师团和常备舰队南下, 做好了武力“接收”台湾的准备。面对日军的大举入侵, 台湾军民“义不臣倭”, 纷纷组织起来, 以一省有限人力、物力, 在外援几乎断绝的情况下, 与具有近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军, 展开浴血奋战。日军前后动用了两个半师团的优势兵力, 在付出了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以及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阵亡的代价, 花费了近半年的时间, 才勉强占领台湾^[1]。

面对实力占优的日军, 台湾军民寸土必争, 誓死反抗, 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 运用灵活的战术来进行斗争。本文在分析敌我双方实力差距的基础上, 对台湾军民在抗日运动中的战术运用进行归类总结, 分析其特点, 阐述了其中的积极意义。

二、台湾抗日军民与日军的实力差距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

也加快了军国主义的发展。所以, 前来“接收”台湾的日军, 是一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近代化部队。相比之下, 台湾剩余的清军和抗日义军则处于缺粮短饷, 武器落后, 外援极少的窘境。双方的实力差距可从兵力、装备、补给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 日军在人数上占有优势。日本早在入侵台湾之前, 就做了有关台湾防卫情况的侦察, 根据日本参谋部编纂出版的正式官方战史《日清战史》, 可以得知在 1895 年 5 月中旬, “.....征清大总督府推算台湾的清国兵力约有三万三千余名”; 另一方面, “台湾民主国”成立时“台民公告”也声称: 台湾“敢战之士一呼百万, 又有防军四万人, 岂甘俯首事仇”^[2], 从双方资料中可以推断, 台湾主要的防卫兵力大致在三万到四万之间。对此, 日本早做了充分的兵力准备。为了顺利占领台湾, 日本前后“大约发动二个半师团的兵力(参与的兵员总计约五万人、军夫二万六千余人、马匹九千四百余头)”^{[3](P102)}, 加上日本国内还可以调动的正规部队, 从作战人员的数量上来看, 日军占有明显的优势。此外, 从军队的整体素质而言, 双方也存在差距。台湾军民为了抵御入侵, 纷纷组织招募义勇, 曾“一时湘、淮、闽、粤、土、客诸军, 风聚云屯,, 然各自为统, 呼应遂以不灵”, 个别情况下“甚至与民相斗”^{[4](P4)}, 可见在作战协调与指挥控制上, 台湾方面较差; 而清军的战斗力普遍偏弱, 这在甲午战争中也已不是秘密。

参见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5 年版的许佩贤著作《攻台战纪: 日清战争. 台湾篇》第 102 页; 《日清战史》是日本参谋部编纂出版的正式官方战史, 分 8 卷, 装 6 巨册, 许佩贤女士翻译后出版的部分, 是第 8 篇第 35 章与第 10 篇(包括 39~42 章), 书名为《攻台战纪》。

收稿日期: 2007-11-27

作者简介: 黄俊凌(1977-), 福建漳州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中国近现代史博士, 研究方向: 台湾近现代史。

相比而言,日本早已施行国民义务兵役制,军队训练有素,并且经过了甲午战争的考验,显然更加凶横和强悍,台湾抗日军民明显处于下风。

其次,日军的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甲午战争期间,台湾巡抚邵友濂在台湾布防,做了一些武装准备。但“仅在沪购旧式枪千余杆”,沿海各省也只有“粤督谭钟麟应旧枪二千余杆,闽督边宝泉应火药数千斤、旧枪数千枝、……,其余无一应者”^{[14](P4)}。这样的备战对于保卫台湾来说,是不够的。可见当时台湾防军的武器装备,不足且落后。在日军控制台湾海峡后,外援几乎断绝,抗日军民的武器愈发匮乏,日方战地记者曾描述,“向来敌兵都约有三分之一没有携带武器”,如果是民众自发组织或招募的义勇,装备就更为简陋了,“往往使用猎枪、木炮等,十之六、七皆无火器,仅携带剑、戟、竹枪等”^{[15](P143)}。相比而言,日军则装备精良。步兵、骑兵均配备村田式单发步枪;火炮方面则种类繁多,有榴弹炮、山炮、臼炮、机关炮等,特别是机关炮,杀伤力极大,“如以全力发射,一分钟可达六百发;平常随便也能发射二百发以上”^{[15](P110)},这种压倒性的火力优势,给台湾军民反侵略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困难。彰化人吴德功的《让台记》,就曾记载日军的火力优势对己方的威胁,如“开花大炮,以马驮之,一刻钟放数十响,出口即破裂开花,流星飞打,军队皆退却”,“台人皆目所未睹,各相惊骇”^{[16](P56)}。显然在武器装备上,敌我双方的差距巨大,台湾军民处于绝对的劣势。

第三,在双方的后勤补给保障上,日军也远胜台湾。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日本就已经军事占领了澎湖,控制了台湾海峡,等于是掐断了台湾与大陆的海上交通线。《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外交压力,不敢公然援助台湾,大陆沿海各省也因“电旨不准接济勇饷、军械”,援助随之进一步减少。河南候补道易顺鼎求援两江总督张之洞时,张氏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只言“至饷械垂尽,则惟有用‘草船借箭’之法;果能得手,敌之饷械皆我之饷械也”。即使有的省份给予援助,也是杯水车薪,而且是巧借名目,如粤督谭钟麟资助三万两银子,“此次三万以资遣勇丁为词,与札饬回任之文同解,朝廷当不以为非,倭见之亦不能夺”。但同时表明,“此正而谲也,不可屡试也”^{[17](P12,14)}。可见当时即使有点援助,也是要费尽周折,假借名目才行。在台北沦陷后,“时军储、电线、铁路、机器局及茶、糖、盐、磺、樟脑、茄楠、沉香与金、煤诸矿大利皆在台北,遂举为倭有”^[18],这对于台湾抗日军民来说,是钱粮、物资与军械上的一个重大损失。为了解决军饷问题,台南的刘永福不得不发行银票来充饷。可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财政状况的恶化,“初时全使银票,台南城内外、邻近各处尚觉通行;到九日中,城内外亦无人肯用了”^{[17](P72)}。相较而言,日军则是粮饷、军火补给充足。1895年,日军用于后勤补给的运输服役军夫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一十四人;驮、挽马四千五百一十四匹,

用于兵站粮食运输的辘重人力车共有六百六十七辆,其余辘重人力车约二千八百七十六辆^{[3](P414)}。当然,在这背后还有日本国内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做保障,基本上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总的说来,台湾军民反对日军占领台湾的斗争,是在外无援助,内缺粮饷、军械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与当时军容整齐、装备精良,挟甲午之胜而士气高涨的日军相比较,显然处于极端的劣势。这种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以及台湾所处的困顿环境,直接决定这场正义的反侵略斗争必然十分艰苦,较难取得胜利。

三、台湾军民抗日运动的战术特点

1895年5月29日,日军在台北的三貂角登陆,开始了侵略台湾本岛的战争,一直到该年十一月底,才基本上控制整个台湾。在此期间,台湾军民进行了近半年的艰苦斗争,他们“义不臣倭”,寸土必争,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激烈的战斗。面对优势敌军,台湾军民尽可能地利用一些有利地形,采用合理的战术、战法来打击侵略者,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具体战术大致有如下四种:

1.利用地形、地物构建防御工事,抵御日军进攻。面对敌军的侵略,台湾的清兵和义勇往往利用地形,凭险而守,特别是在防守各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时,比如台北狮球岭、新竹的十八尖山、彰化八卦山等,均是这种情况。除此以外,更主要作战方式是各地的抗日军民,利用其所在的街道、村庄的地形、地貌,据屋防守,迫使日军进行巷战似的攻坚战。较为典型的如:日军在进攻中坜东南面的安平镇时,义军所坚守的屋厝是“以耐火砖瓦建成,周围竹林浓密,墙壁四周皆开有被掩蔽起来的枪眼,其设置甚至为二段式或三段式的”,屋厝外围的“第一道防御线是竹林,竹高约一米有余,盘根纠结,纵横交错,在其后方堆有同样高度的耐火砖瓦,或直径一公尺左右,捣土压实的堡垒”^{[15](P123)}。再如云林县的岑伦庄,也是类似的防御结构,“……房屋周围竹林密接,形式二、三层的密网,连伸入一只手的空隙都没有,竹围后面一带还筑有高墙,村子边缘则有积水壕沟,入口处以粗大竹子做成栅门,左右堡垒上皆插有斜切削尖的竹子,宛如刺猬一般”。这类防御工事,有效地削弱敌军的火力优势,如岑伦庄的工事,在日军眼里:“我军共发射将近一千发的子弹,却一点效果也没有。接近竹林射击,子弹却被竹林挡住,弹射出来,反而伤了友军”^{[15](P306,312)}。而且,这种房屋的建筑地形往往处于炮火的死角,有时即使是日军有名的炮术专家都无可奈何,象云林街庄的房屋工事,日军的炮兵技术专家藏田少佐亲自指挥炮击,都无法对防御工事形成直接威胁^{[15](P306)}。

独特的地形与坚固的防御工事,经常使日军的进攻受阻,并且伤亡惨重。日军往往要靠工兵冒险进行

火药爆破，或者步兵逼近房屋进行火攻才能有所效果，但却要付出重大的伤亡。这种依凭竹林建构防御工事，本是台湾人民在开拓土地过程中，用来防御野兽和生番袭击的一种方法，但却在保卫家园的抗日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破坏交通、通讯设备，袭击日军后勤补给线。日军占领台北后，台湾义军便尽可能地毁坏台湾北部的交通与通讯设备。台湾北部“各处电线都遭到破坏，在海山口（台北县新庄市）、龟仑岭顶庄（桃园县龟山乡）间的铁路也受到稍许破坏”^{[3](P137)}，日军在中坜附近行军时，也发现“铁路枕木多已被拔除，要不就是移去枕石或挖个大窟窿”^{[5](P105-106)}。这种破坏给日军的行军与联络造成巨大的麻烦，延缓了其南下行军的速度和后勤补给的流畅，有效地打乱了日军的军事部署，也为台中的抗战准备争取了一定的时间。除此以外，袭击日军的辎重、补给队伍，不仅直接破坏日军的后勤补给，夺取敌人战略物资补充自己，并且也能打击侵略者，消灭小股敌人。所以，歼灭日军补给护送队是抗日义军常用的歼敌方式之一。如义军在台北县的三角涌附近，袭击日军近卫师团的一个粮食监护队，除了三名逃脱外，其余日军全部被歼灭，十八艘运粮船均成为抗日义军的战利品^{[5](P126-129)}；嘉义县布袋口附近日军工兵第二中队与步兵第五联队第三大队的行李监护队遭到抗日义军的掩袭，不是损失人员就是丢失弹药或医疗用品^{[3](P299)}。类似的情况在日军的侵台过程中频频发生，影响了日军的整体作战部署，不得不增兵扫荡占领区。

3.采用伏击战术，最大程度地杀伤敌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往往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指导原则，伏击战则是体现此种指导思想的具体战术之一。台湾军民在抗击日军入侵的过程中，大量地采用了伏击战术，不同程度地消灭敌人。如义军首领之一的徐骧，在彰化“屡以伏兵扰日军，义民亦迭起抗之；日军屡窘，多伤亡”^[9]。较典型的是在云林斗六，面对优势的敌军，抗日义勇们在“斗六大路，……，或埋地雷，溪底或开地窖，以陷马足。兼以蔗园、林投埔，台民沿途埋伏袭击”^{[9](P66)}，与强敌相持达一月之久；还有象嘉义县北打猫庄，抗日义军的两个统领杨泗洪与朱乃昌，在日军驻扎的大埔林设伏，到了夜间“引百人呼而入，纵火四处，敌大惊，踉跄奔出，则被我军截击，敌大乱，……”^[10]，结果八百日军被歼灭大半。此后，云林附近各处义军乘此大胜收复云林县，迫使“各处日军多退，云林地无敌踪”。甚至产生了“敌军大震，大队不敢行，严防各路”的心理震慑效果。此外，台湾军民还在伏击战中，结合地雷火炮，力求予敌最大的杀伤。较为有名的是嘉义保卫战，黑旗军将领王德标，在通往嘉义的“沿途各隘路埋下地雷火炮”，然后派老弱之羸卒，从打猫道诱敌入地雷阵，结果“敌出不意，轰及千人，死数百人，能久亲王受重伤”；黑旗军与其他义勇武装乘机击退日军，取得

了一场胜利，并且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此伤重而亡，这是日军在台湾丧命的最高将领。从上述战例中，可以判断出伏击战在台湾军民的抗日战斗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4.虚实结合的游击战。日军在入侵台湾的过程中，最头疼的除了伏击战外，就是一些虚实结合的游击战了。特别当地居民的假装顺从，或者诈降，都起到了实际效果。日本随军记者野口胜一就曾描述过这样的情况：“由台北至新竹的铁路线以南，大姑陷河两岸地带，到处都是不服皇化的敌军。一旦遭逢优势的我军部队，就箠食壶浆，假扮良民；若仅是少数队伍，便加以惨虐袭击”^{[5](P165)}。这在吴德功的《让台记》中也有体现，“初，日本骑兵在三角涌受民厚遇，寻而居民或耕烟割草，或山中逃走，用计袭击日骑兵，出没无常；一旦反抗，草木皆兵。自是日受居民杀伤，有不能固守所领阵地之势。日本支队与台北断绝，粮秣悉归居民手”^{[9](P44)}。再如凤山、枋寮间的麟路庄，日军桑波侦察队来到时，“家家户户都贴着归顺的白纸，还在衣襟上缝着写有‘良顺之民’的布片，民情十分稳定”^{[5](P437)}。但后来日军发现，组织伏击他们的，正是先前箠食壶浆欢迎他们的庄民。可见，这种以诈降来迷惑日军，进而通过游击战，避实就虚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术，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往往使敌军无法确实分辨敌我，而且杯弓蛇影，疲于奔命。在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这不失为一个绝佳的战术选择。

四、台湾军民抗日战术特点的实际意义

台湾民众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时候，上文所述的各种战术大多是综合运用的，并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日本侵略者在受到沉重打击后，也会变得穷凶极恶，对占领区进行变本加厉的扫荡报复，在游击战频繁的地方施行“焦土政策”，烧毁沿途村落、房屋，比如在抵抗激烈的三角涌，日军山根支队“将贼徒的房舍全部烧毁”；在台北县二甲九庄附近，日军“击退盘踞正面高山及占山的残贼，沿途烧毁许多聚落”；日军藏田大队从海山口出发，“一路上且剿且行，……炮轰各聚落，放火烧屋后，即在此地宿营”^{[3](P191)}。根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辑出版的《警察沿革志》，可以看到，从1895年7月22至25日这短短四天，日军的野蛮镇压是很惊人的：“歼灭敌人数百，烧毁房屋数千。沿路各村落敌我的枪声爆炸声不断，叫喊声不绝于耳。事后，三角涌附近数里内不见人影”^[11]。正是凭借着优势的武器和残酷的手段，日军将各地的抗日活动镇压下去。在光绪乙未年的抗日活动中，台湾军民虽然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然而由于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最终没能取得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台湾军民所运

用的各种战术,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首先,直接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日军在侵台过程中伤亡惨重,远远超出它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特别是其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及山根信成少将也在战斗中受伤而亡,这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打击;其次,这些战术在以后的抗日游击斗争中,继续得到应用和发挥。日军占领台湾后,建立了殖民统治,但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各种抗日游击斗争继续展开,以简大狮、柯铁、林少猫等为首的抗日义军,纷纷建立根据地,与日军进行更为艰苦的斗争,继续采用各种灵活战术,打击敌人。再次,这些战术的应用,实际上体现了台湾军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各种战术的创造和运用都是台湾军民智慧的结晶,这背后体现了他们不甘为亡国奴的反抗精神与民族气节。日军随军记者大田才次郎对此有很深的感慨:“等到深入敌境之后,才发现贼兵出没无常,实非吾人所能想像”,

参考文献:

[1] (日)藤村道生,米庆余.日清战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79.
[2] 中国史学会.中日战争(第1册)[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03.
[3] 许佩贤.攻台战纪:日清战争.台湾篇[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203.
[4] 思痛子.台海思恸录[A].台湾文献丛刊第七辑[C].台北:大通书局,1987.4.
[5] 许佩贤.攻台见闻:风俗画报.台湾征讨图绘[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
[6] 吴德功.让台记[J].台湾文献丛刊第七辑[C].台北:大通书

局,1987.
[7] 易顺鼎.魂南记[A].台湾文献丛刊第七辑[C].台北:大通书局,1987.
[8]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A].台湾文献丛刊第七辑[C].台北:大通书局,1987.55.
[9] 罗惇彞.割台记[A].台湾文献丛刊第七辑[C].台北:大通书局,1987.4.
[10] 洪弃生.瀛海偕亡录[A].台湾文献丛刊第七辑[C].台北:大通书局,1987.15-16.
[11] 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王洛林.台湾抗日运动史[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0.142.

五、结束语

在清代光绪乙未年间,台湾军民为了反对日本侵占台湾,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结合具体地形和情况,运用多种战术来进行抗日斗争,力求保卫家园。尽管由于实力差距,加上抗日军民自身内外条件的局限性,这场抗日斗争没能取得成功,但当年台湾军民反抗斗争中采用的具体战术,体现了他们的民族气节和反抗精神,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蒋民胜]

(上接第141页)比例是:4:4:2。公共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的比重大于实际训练课。这与上海市内重点大学多、文化氛围浓有一定关系。^[9]与上海相比,深圳市港澳台和外资投资开办的企业多,社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注重中职、高职毕业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该市的职业教育比较重视技能训练课,而对文化课相对减少。例如,深圳市高职院校的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和实际技能训练课比例为2:4:4。在法规上,深圳市制定了全国第一部专业规范职业技能鉴定的地方性法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上海职业教育不断前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9).
[2] 虎啸.一树桃李满园春[J].职教通讯,2002,(3).
[3]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所.上海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4;243;126;20.
[4] 苏国炎,彭卓平.中等教育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M].中山

规——《深圳经济特区技能鉴定条例》,在执行中,不少中职校很重视学生到企业的实习。例如,深圳南华中学、深圳职业技术学校、深圳博伦职中学校等职业学校都经常组织学生到合作企业上实际操作课。
上述六个方面仅仅是从大的视角对比了两城市职业教育的异同点。由于两城市职教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学者对比的角度也不相同,因此,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本文仅是一孔之见,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果。

大学出版社,2001.364.
[5] 黎万红,卢乃桂.从青少年的角度探讨上海市及深圳市职业教育的发展[J].青年研究,2003,(8).
[6] 王雪.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实习[J].辽宁高职学报,2002,(4).
[7]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跨校选修章程[Z].

[责任编辑:周玉枋]